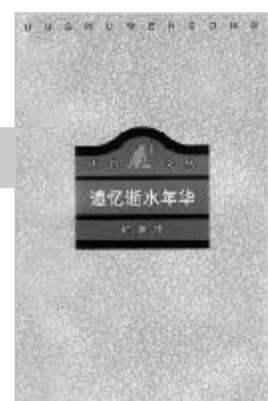


许渊冲：100岁的美与快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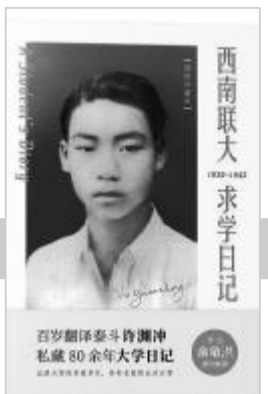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张文静



许渊冲



《追忆逝水年华》



《西南联大求学日记》



《书信里的逝水年华》



《许渊冲译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一卷)



《翻译的艺术》

6月17日,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逝世,享年100岁。

对于许渊冲来说,时间仿佛一直是朋友而非敌人。17岁,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35岁,开始出版译作;60岁以后,愈战愈勇,以“一年至少新译一本名著、出一本论文集、写一本散文集”的速度创作;89岁,获得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93岁,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94岁,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96岁,登上央视节目《朗读者》,成了常上热搜的“网红”;100岁,出版《许渊冲译莎士比亚戏剧集》《许渊冲译莎士比亚戏剧集》《许渊冲百岁生日自述》等多部著作,去世前还在写自传《百年梦》。

读书、译书、写书,贯穿这位百岁翻译家的一生。

读书:追忆逝水年华

在写作《百年梦》之前,许渊冲已出版过《追忆逝水年华》《西南联大求学日记》《梦与真》《锦年琐忆》等多本自传。

在这些回忆录中,西南联大时期的求学经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许渊冲回忆了自己在学校里听冯友兰讲唐诗、冯友兰讲哲学、叶公超和钱锺书讲英文、吴宓讲欧洲文学史、柳无忌讲西洋文学、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译诗与译诗等“奢华”经历。

大学生涯也对他的翻译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老师吴宓改变了他的翻译观念,让他从喜欢鲁迅的直译理论,转向“还是意译有道理”。大一时,许渊冲第一次尝试把诗歌翻译成英文。那是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纪念诗《别丢掉》,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两个灵光一现的绝妙韵脚,顺便夸了夸自己:“第一次译诗自得其乐,还有一点小小得意呢!”

除了回忆承教于大师的岁月外,在回忆录里,许渊冲还忆起了当年的同学。“我不是一个好孩子。那时我们都崇拜那些不怎么学习但成绩也很好的学生。觉得那才叫厉害。”许渊冲写道,大一英文期末考试总共两个小时,杨振宁只用一小时就交了头卷,成绩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积分课的考试,不是100就是99分。“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了。这不是天才吗?”

毕业后多年间,许渊冲与老师钱锺书仍有书信往来,探讨诗歌翻译的问题。1983年,许渊冲由洛阳调到了北京大学后,还专门跑到中国社科院去找钱锺书,双方为了译诗“求真”和“求美”的矛盾辩论不已。“钱先生最后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

2020年出版的《书信里的逝水年华——钱锺书与我》就集结了他们20余年间的往来书信,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译书:诗译英法唯一人

4月18日,许渊冲度过了自己的百岁生日。就在4天前,他还出席了“100岁的美与快活:许渊冲汉译经典全集”第一辑新书首发式。自2020年6月至今,浙江大学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许渊冲译莎士比亚戏剧集》。这些都是许渊冲近年倾力所著,也是他翻译的集大成之作。

许渊冲的译作出版从1956年的德莱顿《一切为爱情》开始。此后60余年间,他将《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译成英文法文,也把莎士比亚、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等作家的代表作品翻成了中文。

已故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顾毓琇评价他将“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许渊冲译成“You can enjoy the grand sight, 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体现了押韵与对仗的美。在他看来,如果将“千里”直译成 li 或者 miles 都不好,把“楼”直译成 floor 或 storey,也都丧失了诗意的感觉。在不违反求真的条件下尽量求美,是许渊冲一贯的坚持。他说,“贝多芬甚至说过,为了更美,没有什么规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再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许渊冲认为,如果照字面翻,外国人是看不出美来的,“因为他们不像中国人,不理解月亮是代表团圆的”。他认为自己翻成“床曾经在如水的月光中,于是我也沉浸在乡愁中”,是一种再创造。“译成外文,必须为外国读者着想!”许渊冲曾在参加《朗读者》节目时递出一名片,上面写着“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乍看起来非常自负,但许渊冲却说,这不是自负,而是自信。自负是虚荣地说假话,但他说的都是自己实打实翻译出来的作品。

写书:一章一句真性情

也正是这种典型的许渊冲式意译,给他带来了几乎伴随一生的赞誉与批评。

许渊冲在《文学与翻译》《翻译的艺术》等理论著作以及他的自传、散文集中多次阐述了自己对文学翻译的散文,也涉及自己与其他翻译家围绕直译与意译、“真”与“美”的论战。

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尽量在形式和内容上忠实于原文。许渊冲却认为,翻译不应拘泥于原作,而应讲求再创造。哪怕是在许多同行看来应当平铺直叙的时候,他也要在用词的节奏和色彩上,添上自己的理解。

翻译家施康强曾撰文分析了《红与黑》开

卷第一句不同版本译文的特点,同一句话,罗新璋译成“风光秀美”,到了许渊冲那里,就扩张成了“山清水秀,小巧玲珑”。翻译家韩少功评价说,许渊冲的版本“不仅与原文大不相同,而且已经不像翻译,而是创作了”。

许渊冲与西南联大校友、《红与黑》的国内第一位译者赵瑞蕪也有争论。同一句法文,赵瑞蕪译成“我喜欢树荫”,许渊冲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赵瑞蕪用市长夫人“去世”了这种译法,许渊冲则译成“魂归离恨天”。

许渊冲认为,这两种观念的根本不同是实境与真境的差别。“喜欢树荫”是实境,可若是思考后晓得市长的喜好评于大树底下好乘凉,才可进入真境。同理,市长夫人去世也是实境,可故事中,她并非自然死亡,而是含恨而死。于是,他认为自己翻译的版本才“进入了真境”,得了原真真意。“还找不到比‘魂归离恨天’更好的译文吗?”许渊冲反问道。

争论归争论,当参与翻译的《追忆逝水年华》出版时,许渊冲也给赵瑞蕪寄了一套,还不忘在扉页里题一句——“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令人哭笑不得。

许渊冲从不掩饰自己率性张扬的个性。他在自传《追忆逝水年华》中大方罗列了国内外对自己的赞誉;在散文自选集里称他的“三美”“三化”理论达到了西方对等论无法达到的高度。即便是翻译界的泰斗傅雷,他也认为并非不可逾越,“可以拿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和他的比,整本水准绝对高过他。你随便摘10段出来,我不怕。”

有人读《追忆逝水年华》,既觉得痛快,又感叹此人毫不自谦、语气狂放,“狂作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倒都是真性情”。对于读者来说,许渊冲为文学大餐提供了别样的风味。至于是崇“真”还是爱“美”,读者心中自有评判。

荐书



《火车梦》(美)丹尼斯·约翰逊著 张芸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5月出版,定价:42元

本书作者是以短篇小说集《耶稣之子》和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长篇小说《烟树》蜚声文坛的美国作家丹尼斯·约翰逊。《火车梦》是一部微型史诗,是他最动人、最凄美的小说之一。于2002年在《巴黎评论》首次发表,翌年获得欧·亨利奖。

小说讲述了20世纪之初不平凡的时代,一个凡人罗伯特·格雷恩纳的故事。他在美国西部以打零工为生。遭受丧失至亲之痛,格雷恩纳挣扎着寻找在这陌生的新世界活下去的意义。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看到他个人遭受的种种惊心动魄的苦难,也见证了他在美国的巨大。

小说仿佛让读者置身于美国西部丰富的历史与风貌之中——那里有奇异的动植物,有强健的伐木工和造桥工——捕捉到一种独特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消失过程。



《议论与法社会学:通过沟壑寻找最大公约数的研究》季卫东编著 译林出版社 2021年5月出版,定价:88元

本书是一部法社会学领域的原创论文集。作者提出了“议论的社会学”这一学术新范式。

无论从历史传统的角度,还是从当今实践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法律秩序,都会发现程序正义观念的匮乏。法律的本质就是沟通,就是话语全覆盖,通过辩证寻找正确判断的过程。无论是从法社会学角度来考察和理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还是以庭审为中心来推进司法系统改革,都不得不聚焦程序与议论。

本书将法律视为一种社会结构,细致分析了法律与社会复杂性、偶在性和人的期望之间相互衍生关系。对在利益分殊的当下如何通过对话寻求共识进行解答,为在风险社会中如何保持交流畅通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作者季卫东为法学家、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发表程序论,现又提倡“议论的法社会学”,研究思路一脉相承。



《每个词语都是一只歌唱的小鸟》(英)丹尼尔·塔米特著 邵逸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年5月出版,定价:49.80元

丹尼尔·塔米特,英国数学家、散文家、小说家,世界公认的天才,拥有超乎常人的心智、记忆力和数学心算能力。关于他的纪录片《大脑》曾打破英国收视纪录。

塔米特曾患有自闭症,但他对数学和语言异常敏感,在对语言的学习中,他奇迹般地开始接受自己,打开心扉,探索世界。他掌握了11种语言,能在1周内快速学会难度极高的冰岛语,并自创过一门语言,发明了近千个词语。在塔米特眼里,语言有着独特的魅力,每个词语都有自己的个性、颜色、形状、质地。

本书由14篇文章组成,从英国到立陶宛、从墨西哥到冰岛、从法国到非洲,我们将随作者一起聆听语言背后的故事,解码不同语言的文化意义。



《成为梵高》(英)高·顾令著 北京联合出版集团 2021年4月出版,定价:88元

市面上那么多有关梵高的书,有哪本您看完了呢?“我想写的,就是一本大家能看完的梵高。”因在微博上连续发布《小顾聊绘画》系列长微博,顾令广受关注。

在割耳、自杀之前,梵高到底看到了什么?梵高要在巴黎颠覆印象派,为何又忽然离开巴黎?在人们熟悉的梵高的故事中,真正精彩的是他活着时的故事——一个个我们本以为是熟悉却充满悬念的谜团。

这不是一本梵高生卒大事记。作者拎出了两条线索,一条写梵高人生的最后四年,另一条写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在最后四年,一场改变世界的运动正在书写历史。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梵高终于领悟了所有艺术家毕生追求的奥秘。(喜平)

书摘·百年征程看科技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叶梅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曾经走过的关键历程:

对撞机方案“七上七下”之后,最终于1982年底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批示。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研制的坚定支持者。早在1977年,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总主任阿达姆斯来访时就曾问邓小平: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开展高能物理研究,搞高能加速器?邓小平说:“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既然要搞四个现代化,就得看高一点,看远一点,不能只看到眼前。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可以带动许多方面,也许这个决心可以帮助我们发展的程度提高得快一点。”

邓小平多次强调,虽然建造高能加速器耗资巨大,但从长远看很有意义,“非搞不行”。他亲自推动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多次在会见外国科学家时提出希望派人去国外工作和学习。

全国数百家研究所、工厂、数以万计的科研技术人员承担了对撞机上千个部件的研制任务。

1982年完成包括注入器、储存环、输运线和谱仪的初步设计,提出基建要求和造价估计,并开展了预制研究。

1983年改进设计,个别预制样机研制成功。

1983年12月,中央决定将对撞机工程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并成立了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不久,由14个部委组成工程非标准设备协调小组,组织全国上百个科研单位、工厂、高等院校大力协同攻关;土建工程由北京市负责全力保证。

1984年10月,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该年年底,能量倍增器试验成功,90兆电子伏电子直线加速器出束。

1986年进行设备安装。

1987年开始总调,正电子注入储存环。1988年7月,同时储存正负电子束,之后开始大型粒子探测器北京谱仪联调。

1988年10月16日,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亮度达到 $8 \times 10^{20} \text{cm}^{-2}\text{s}^{-1}$,北京谱仪首次捕捉到正负电子对撞后的散射事例(巴巴事例),中央控制室里一片欢腾。在数以百计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欢呼中,我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宣告建成。中国高能加速器技术一步跨越30年,直接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中国高能物理的一个新时代终于到来!

一步跨越30年。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从无到有建成对撞机,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样的建设速度在国际加速器建造史上也属罕见。如此庞大的高、精、尖科研工程,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和挫折,一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指标,树立了我国科技领域一个坚实的里程碑,是中国人智慧、执着、自力更生、团结协作的见证。

1988年10月24日,金秋时节,邓小平来到北京玉泉路。他稳步走进高能所一个大厅,附近就是正在运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那天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沿着直线加速器长廊,走进了周长200多米的储存环地下隧道,再到探测大厅,还到了计算机控制、数据分析中心及同步辐射装置大厅,兴致勃勃地察看了对撞机的全部系统。爬上爬下,都不觉得累,兴奋地边走边听李政道、谢家麟几位专家的讲解。

那天,邓小平会见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者和出席中美高能物理委员会第八次合作会议的代表。随同老人前来的,还有他的女儿邓楠。他说,邓楠是来给我当翻译的。大家不解,老人说,我的耳朵听不见,她来帮我翻译大家说的话。

在听取了关于对撞机建设情况的汇报

后,老人啜了一口茶,面带微笑地发表了即席讲话,但讲话的内容显然是深思熟虑已久的。他说:

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



《大对撞》叶梅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9年9月出版,定价:68元

本书讲述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从立项、建设到出成果的艰难漫长的历程,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生动的事例歌颂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王淦昌、朱洪元、谢家麟、叶铭汉、张文裕、周光召、方守贤等对科学创新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和无私奉献精神,高度评价了李政道、丁肇中、袁家骝、吴健雄等华裔科学家的爱国情怀。本书在彰显我国高能物理事业发展的同时,以丰富的事实见证、体现了党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极为关键的领导,激发爱党爱国的民族自豪感,提升民族自信心。

后,老人啜了一口茶,面带微笑地发表了即席讲话,但讲话的内容显然是深思熟虑已久的。他说:

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

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会越来越大。现在我们的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有政道教授和其他国际朋友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

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他转过头来,朝着所有的人粲然一笑,面若秋霜。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今天的世界风云证明了邓小平卓越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我们所幸早已占有一席之地。